

党史上的廉洁纪律建设

□ 严哲文 陈 坚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坚持反腐倡廉，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廉洁纪律建设之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倡导清廉政治，对党员的廉洁方面提出专门要求，如果违反就要被坚决清除出党的队伍。北伐战争期间，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党内一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为此，1926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要求对党员进行审查，混入革命队伍投机的腐败分子一经发现，务必“洗刷出党”，为纯洁党的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非常注重廉洁纪律建设，严惩腐败分子。1932年5月，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公审判处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死刑，打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腐败的第一枪。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项英关于反腐败的训令和指示，要求对党内人员贪污公款、浪费公款等腐败行为，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惩罚。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贪污分子、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者被法庭制裁、受到各种处分的就有46人。

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延安后，党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党龄多长，都“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陕甘宁边区一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被依法处以死刑。《解放日报》发文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邓小平深

刻指出，对于腐败和犯罪，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中央纪委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和特权现象。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深入，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也侵入党内政治生活，针对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党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厉查处成克杰、胡长清等大案要案，有力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决纠治“四风”，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惩治腐败，严肃查处一大批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再次宣示反腐败倡廉的立场、决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重视廉洁教育防患于未然

廉洁教育是推动廉洁纪律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正所谓“上医治未病”，廉洁教育的意义在于惩戒于已然、防患于未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就非常注重通过培训、学习检讨、揭批审判等方式对党员进行廉洁教育。针对多数党员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人民委员会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加强对县级及其以下的苏维埃政府基层干部的教育，尤其重视对他们进行廉洁教育。当时创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以“红板”专栏刊登公廉洁的优秀党员和先进事迹，并以“反贪污浪费”专栏批评贪污、腐败和浪费等现象，以此净化党员干部的思想灵魂，抵挡升官发财的诱惑，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锻造出“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抗战时期，作为八

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为了接济川中老母，给旧友写信求援，声称自己“数十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体现了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极度廉洁，这对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无疑也是最好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廉洁纪律建设面临新的考验。面对权力和诱惑，部分党员干部逐渐走向腐化堕落。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刘张二人以功臣自居，经不住诱惑，滑入了腐化享乐的泥潭。为了警示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以挽救更多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河北省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刘张二人死刑，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廉洁纪律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引导形成“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的价值观；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生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所有这些，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完善法规制度夯实纪律根基

100多年来，我们党注重通过完善法规制度，为推动廉洁纪律建设夯实根基。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党章也指出：“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

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这些规定表明，党中央加强对经费收支的管控，从制度上避免出现党组织或个人随意使用党的经费的现象。1923年4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颁布《经济委员会简章》，规定一切经济出入和账簿经由审查部审查，并公开账本接受俱乐部人员监督。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制度反腐，以确保苏区干部廉洁自律。1933年12月，中央苏区发布《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为贪污浪费行为制定具体的量刑标准。这是党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法规基础。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多部关于惩治腐败、保证干部清廉的制度法规。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以贪污论罪的10种行为和4个处罚量刑标准。其中将克扣截留财物、挪用公款、虚报账目、浪费公物等均列为贪污犯罪行为；对贪污数目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后，又陆续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贪腐行为、惩处原则、惩处依据、惩处标准等，为加强廉洁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反腐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修订、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逐步构建起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法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



富阳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浙江富春江畔、福善山北侧、金家山之巔。纪念碑碑体由3块高低不等的单体大理石组成，寓意着土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个不同革命时期，三块石碑仿佛3个巨人，俯瞰富春大地这方曾浴血奋战的水土；又如3柄利剑，直插云霄，昭示历史的悲壮与沧桑。主碑高28米，象征着富春江风帆，正面镌刻着张爱萍上将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碑后竖立8块大理石刻，内侧为525名革命烈士英名录，外侧为8幅不同革命时期人物刻雕图。纪念碑平台周围是用花岗石铺设而成的1300平方米广场，广场四周配有大理石栏杆，至广场的424级花岗石台阶两侧设有绿化带，沿途建有观景亭。纪念碑正前方的花岗石台阶中央设有基座，基座上刻有《革命烈士纪念碑铭》，全文如下：

富阳，古称富春。东指钱塘，西望黔山，南引瓊闽，北依天目。毗邻五县，扼吴越于要冲，控三江之吞吐；乃杭城西南之屏障，商贾交会之通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民风淳朴，素为文化之邦。

自秦皇嬴政置县二千余年，伟烈之士，不乏其人。近世以来，尤其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富邦强国，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壮烈牺牲，迄今可考之于县志者，凡五百二十有五。其英名与日月同辉，功业与山河共存！

值此世纪之交，建碑于富春江畔，金家山巔，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碑高二十八米，于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奠基，翌年四月竣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富阳市委 立
富阳市人民政府
公元二〇〇〇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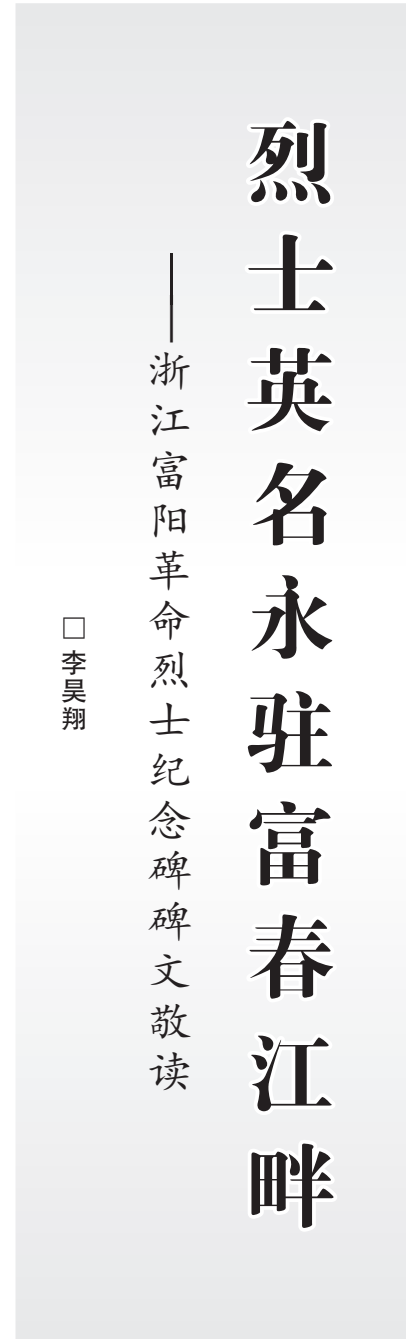
碑文高度凝练了富阳悠久的革命传统和波澜壮阔的近现代革命斗争历程。敬读碑文，气势磅礴、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斗争场景不禁浮现眼前，多少英雄儿女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奋不顾身、血染山河，让人不禁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早在1926年，沈炳铨等4位富阳籍党员，受中共杭州地委指派，回富阳创建党组织。1927年，中共富阳党小组成立，富阳成为杭州地区第一个建立党组织的县。

1930年4月26日，中共富阳县委在富春江洋浦口段江面船上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五一”武装暴动。4月30日晚10时，参加暴动的农军共2300余人，统一臂佩“农军”符号，手持土枪、梭镖、大刀、木棍，分5路冒雨进入指定地点集结隐蔽。由于泄密，暴动夭折。国民党当局随即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军骨干。5月2日，小源区委副书记兼大、小源路农军负责人蔡九华于羊家埭大庙前被国民党宪兵包围，虽奋力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严刑逼供下，蔡九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害于应家塔塔山桥头，为富阳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位革命烈士。之后共有6名县委书记、20多名农军骨干被捕，富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其余领导人、骨干分子被迫秘密离开富阳。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富阳的各界爱国人士奋起反抗，积极投身于壮怀激烈的抗日斗争。

从“五一”暴动中成功脱险的孙晓梅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积极参加抗



□ 李昊翔

烈士英名永驻富春江畔

——浙江富阳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日宣传活动，并于1940年到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镇丹、武进县委妇女部长、中共长江工委委员、镇丹中心县委民运工作队队长等。1943年5月，她护送干部过江后返回，半夜途经营防镇附近，被日本宪兵队特工人员抓捕。日本宪兵小队队长立即设宴“招待”妄图诱降，孙晓梅拍案而起，严词大骂。日军恼羞成怒，将她押到南京龙潭老虎山岙，孙晓梅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富阳籍的著名爱国主义作家郁达夫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郁达夫身负国仇家恨，以笔为枪，奋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暴行和狼子野心。1938年底，他应《星洲日报》邀请，至新加坡任副刊编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悉心培养抗日干部。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士，营救印尼人民和当地华侨，却因汉奸告密被秘密监视。1945年8月29日，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竟遭日本宪兵逮捕，后被秘密杀害。

自全民族抗战以来，浙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配合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积极在富阳周边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两度接应苏浙军区新四军南渡富春江，并配合南渡富春江的新四军四纵十支队，攻打驻守在沧洲的国民党富阳县自卫大队和国民党“挺三”纵队。

金萧支队侦察参谋蒋忠，1945年6月调任路西县大队参谋。新四军北撤时留下坚持斗争，指挥大小战斗69次，多次粉碎敌人“围剿”。1948年6月17日晚，蒋忠前往北坞村工作，途经村口时突遭敌人偷袭，不幸壮烈牺牲。

1946年10月，时任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八团三营政治教导员的孙京良率部参加鲁南马家楼战斗，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同年12月，为粉碎蒋介石对苏北、鲁南解放区的进攻，江苏宿北战役爆发，时任山东野战军一纵队三旅九团参谋长的俞慕耕带领突击营英勇冲锋，猛插曹家集以西地区，歼敌一个工兵营及一个骑兵营大部，击溃一个炮兵连，突入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指挥所附近。由于孤军深入，身陷重围，俞慕耕中弹牺牲。这些烈士的英名，被永远地镌刻在富阳的史册里。

历史话剧《甲申记》： 苏中解放区一堂深刻的“思政课”

□ 林 宁

1945年5月至1946年1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的组织推动下，前线剧团排演的历史话剧《甲申记》在苏中解放区3次巡演约50场，送上文化盛宴的同时铺开了一堂以历史教训为主题的“思政课”，在苏中干部、部队官兵、知识青年和苏中中学学员中产生深刻影响，“决不能当刘宗敏”成为广泛流传的一句革命口号。

《甲申记》剧本由苏中中学的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3位同志集体创作，主要是根据郭沫若所著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改编。1944年6月，中央宣传部与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及各级政治部组织干部学习讨论《甲申三百年祭》，深刻领会“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重大教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都不能骄傲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剧作者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突出历史教训警戒，把剧本题为《甲申记》，意为记甲申年之事，记崇祯之祸国殃民，记李自成之骄傲致败，并在作《〈甲申记〉本事》时直接引用了中央文件关于李自成失败教训的原文表述。对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者集中通过其部下第一员骁将刘宗敏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以大白话式的台词震击观者内心。“打下这个天下，有我一半的功劳”表现的是特功而骄，“崇祯皇帝都完蛋了，还怕一个小小

的吴三桂”表现的是忽略敌人，“老子从小住煤坑，现在住军帐，到北京，不住间好房子，也枉为我刘宗敏一生了”表现的是脱离群众，等等。

更为恶劣的是刘宗敏霸占明末将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逼反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甲申记》最后一幕，被刘宗敏强掳来的陈圆圆没有说更多的话，就是唱了一首凄婉的《圆圆曲》，喷涌而出的却是对刘宗敏进驻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的猛烈抨击，激起观者共鸣而被反复吟唱。沈西蒙记得，有一回走过一个连队，不意遇见一位连长指挥部队齐唱《圆圆曲》，而这个连队打仗很出色。时任新华社苏中分社记者甄为民回忆，“今朝啊，今朝，旧江山换了新主，正要把基业稳固”“当前边患正猖狂，遍地疮痍犹待抚”，这些有深邃思想内涵的歌词，为我们百唱不厌，激起共鸣，大家都以此决心不做被胜利冲昏头脑而遭致亡国亡头的李自成、刘宗敏。

1945年5至7月，《甲申记》第一次巡演在苏中中学广场举行多场，学校借机组织第三期学员观看了两遍，并分队组织学员讨论，开展反省批评，彻底改造骄傲思想和作风。经过热烈讨论，有很多学员认为，“看了《甲申记》比听十次政治报告更有意义”，“反攻到了上海，还不是老子的天下”“过去我老是不看不起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吃干饭的”……诸如此类的“刘宗敏思想”得到查摆纠正。《甲申记》的教育成效在学员抽调参加前线工作队时得到充分体现。参加解放如皋战斗前线工作队的学员，进城后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到离

城没有发生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群众和他们依依惜别，称赞他们是世上少见的好军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中军区集中力量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凌厉攻势，至1945年9月中旬相继攻克7座县城，苏中解放区上空红旗飘扬，广大军民扬眉吐气。此时苏中中学第四期刚开学，不少新学员因为苏中的胜利形势而产生骄傲情绪，有的认为抗战胜利就实现和平，可以“解甲归田”了；有的急于进大城市，“该享受一番”了。为清除和防范骄傲情绪，时任校长的夏征农利用《甲申记》教育经验撰文《在胜利面前使我想起〈甲申记〉》刊登在10月的校刊《学习》上，从《甲申记》中深刻解读“刘宗敏思想”，结合当前形势列出同志们可加以对照反省的种种表现。比如，当敌人宣布投降，我们向城市进军时，我们是不是也有轻敌观点及这样的行动表现呢？比如，当我们的大军进占城市时，我们是不是也有破坏纪律，抗民的现象发生呢？最后旗帜鲜明反对“刘宗敏思想”，希望同志们记住《甲申记》不只是一出史剧，而是我们今天特制的一面镜子，我们就每天拿出这面镜子来照着修修脸吧！

1945年的五四青年节，苏中区党委在苏中中学召开苏中青年代表座谈会，目的是提高青年代表的认识，团结苏中广大青年，坚定地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为配合座谈会，5月4日晚前线剧团为青年代表作《甲申记》首场演出，当天的《苏中报》刊发夏征农的文章《我们怎样编导〈甲申记〉的》。文章强调《甲申记》对于

李自成等后来的“昏昏然”有着充分的暴露，同时又特别表现了几个清醒人物，如李岩、宋献策和真正的农民张正才，对青年代表观看演出并引发如何团结教育苏中广大青年的思考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会上大家形成共识，在做团结教育青年工作时，应防止“知识青年与工农青年互相轻视”“先进青年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两种骄傲倾向。会议结束青年代表回到各地后，动员了不少青年参加解放区工作，也动员了一批青年到苏中中学来学习。

1945年12月，吴天石主编的《甲申记》演出特刊由苏中中学政治部出版发行，刊登剧作者、作曲家、导演和多位主要演员撰写的体会文章，一并刊登《〈甲申记〉本事》和6首插曲，实为很好的戏剧导读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演员入戏说戏的体会文章，通过解读经典台词和表演细节，串联各幕之间的故事情节，深刻分析所饰演人物的性格、思想、心理和其命运的关联，更易引导观者看懂剧中主要人物的表现，读懂这部剧蕴含的时代教育意义。如《我演张正才》写道：土兵张正才与刘宗敏是相反的，他不自骄，很虚心，有正义的勇气，始终保持他一贯的斗志。他有坚强不屈的牺牲精神，是前进的一面，像我们的革命战士一样。

演出特刊的发行，正值《甲申记》在解放不久的如皋县巡演，亦放大了思政教育效应，不仅使观者从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受到教育，还增强了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如皋县有很多看过《甲申记》的青年学生，参军投入了革命队伍。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